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5期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6月18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二届一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李宏,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还有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一级巡视员陈彬斌、公共服务司事业发展处处长王晓松,以及国家图书馆馆办、党办等相关处室负责人。大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会员代表、列席代表以及特邀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李宏充分肯定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推进古籍保护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协会以换届选举为契机,积极参与国家公共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魏大威指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携手共进,促进了古籍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与优势互补,搭建了更为广阔和卓有成效的发展平台。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代表第一届理事会作了题为“勠力同心,主动作为,积极推进中国古籍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工作报告。报告从8个方面回顾了协会6年来的工作历程,从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紧扣协会宗旨,构建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创新工作方式,拓展引入社会参与渠道;面向社会公众,促进中华古籍的活化利用;树立开放思维,开展对内对外交流合作;强化服务意识,推动行业自律和规范发展等六个方面,向新

一届理事会提出工作建议。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情况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章程》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修订案;选举产生了由139人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以及新一届常务理事会和协会负责人。刘惠平当选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张志清当选常务副会长,首都图书馆馆长王志庚、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叶汝强、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甘肃省图书馆原馆长郭向东等5人当选为副会长,王红蕾当选秘书长。

闭幕式上,魏大威向积极参与协会工作,长期致力于行业发展,并为协会作出显著贡献的倪晓建、李忠昊、谢林等名誉理事颁发了荣誉证书;陈彬斌向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李致忠、吴元丰等顾问代表颁发了聘书。吉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吴爱云代表全体会员在会上郑重承诺:遵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珍惜会员权益,积极参与协会各项活动,共同维护行业良好形象和声誉,为古籍保护与传承添砖加瓦。

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理事会的工作。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在第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协会秉承宗旨:开创实施古籍普查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古籍保护项目,有力助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搭建平台,组织古籍保护技术与装备展示,举办技术研讨会,促进古籍保护技术共建共享;多

方联动,面向社会开展专业培训,参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探索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路径;发展分支机构,推动标准立项及项目储备,编撰论著提要 and 从业人员名录,夯实古籍保护行业发展基础;创新思路,多方争取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古籍保护;支持会员单位开展工作,推动海峡两岸古籍保护交流,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多管齐下,有效树立了协会在全社会的良好形象。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于2015年,是由古籍收藏、保护修复、整理出版研究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相关机构及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现有会员474名,下设6个分支机构。协会成立以来,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和古籍保护工作,在建立古籍保护行业协作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对于协会未来的工作,刘惠平表示,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不久前中宣部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提出从记忆、传承、创新、传播四个方面着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延续中华文脉。协会将围绕这一目标,在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的领导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支持下,依靠理事会的集体力量,发挥全体会员的聪明才智,主动融入国家文化发展大局,推动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创新发展。这是协会念兹在兹的初心,也是行业组织的使命和责任。

白玉静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三版首批条目发布

本报讯 7月24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首批条目发布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首批条目,包括网络版中文条目约21万个、中国主题英文条目1000个、纸质版3卷,并同步上线中国社科词条库,同时围绕扎实做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工作进行了座谈。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2014年正式启动,此次发布的是首批阶段性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工作,包括网络版、纸质版、外文版,网络版条目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首批发布条目涉及近百个学科,近3万名专家学者在百科三版总编委会的组织协调下参与撰稿,1000余名专兼职力量参与编校审稿,力求条目内容权威准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工作启动以来,在传统百科条目编纂方式上积极创新,较《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以更好适应互联网时代读者阅读使用新需求。首批条目发布后,将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条目内容、优化网站功能体验。

会议强调,《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出版,是国家基础性文化工程,是巩固网络舆论阵地、提升网络舆论话语权的战略工程,是推动我国百科出版转型升级、拓展知识服务的创新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高站位谋划、高水平推进,在编纂水平和出版质量上达到一流,努力建成有中国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百科知识库。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同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社科词条库有关负责人、主编、编辑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金晶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晔(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燕(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井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探索革命文献收藏研究整理出版传播新路径
“望道出版论坛·2021”在京成功举办

李显扬/摄

本报讯 7月24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望道出版论坛·2021”。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龙新民,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中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郑德兴,以及来自国内革命文献史料研究及出版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40余人与会,共同探讨革命文献史料的收藏、研究、整理及传播出版。

论坛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铁主持,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邓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分别致辞。

邓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献的收藏、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次论坛的举办,既是深情表达对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的敬意,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切实举措。一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高度重视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全力支持广西师大出版集团聚焦革命文献史料、革命文化典籍等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希望广西师大出

版社集团深刻掌握党发展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积极宣传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当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造就的伟大精神、形成的伟大思想,浓墨重彩地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把促进革命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轩庄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和砥砺奋进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上,做好革命文化的弘扬传承、出版传播工作,在新时代有新作为,这是时代赋予出版人的崇高使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携手学界各位专家,齐聚北京举办望道出版论坛,既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表达敬意,在弘扬光荣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还是探索新时代革命文献收藏、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新路径,在赓续红色血脉中开创新篇的切实行动。

龙新民在主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在改革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成绩,并指出本次出版论坛以“望道”为名,在当下全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中举办很有意义、很有必要,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传承陈望道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出版家的革命精

神,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要求以及庆祝建党百年讲话中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非常契合。

聂震宁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本届望道出版论坛对于议题的设定,充分体现了主办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对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高度重视。革命文献史料的收藏、整理、研究及出版传播,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性工作;革命文献史料作为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主要载体,系统的文献整理,也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要坚定文化自信,必然要加强革命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而在这个过程中,应把握文献史料出版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邓纯东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描绘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画像,我们要传承弘扬好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坚定、人民至上、英勇斗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红色精神。

论坛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中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郑德兴,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陈锡喜,中共广西壮族自冶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田玄,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汤志华,嘉兴学

院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主任康文龙,福建省平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山梁,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博士邱辰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首席编辑曹光哲等专家学者,分别针对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发言,共同探讨革命文献研究整理的前沿理论及其出版优化路径,并在深入交流中凝聚更大共识,以共同推动革命文献史料得到更科学高效的利用,助力革命文献出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次“望道出版论坛”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奋进新征程,着力推进集团主题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望道出版论坛”旨在弘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广西师专中文科主任陈望道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守望真理、坚持大道,为学界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不断推出现“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出版精品力作。

论坛期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同步举办了主题出版精品书展,展出了《湘江战役史料文丛》《大变局下的国家治理:中国国家制度展开及战略思维》《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化广西》《初心如故》《云上光辉》《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从北平到延安》《天路行军1950》等数十种主题出版图书。论坛还重点研讨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主题出版重点项目《中共创建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的编纂出版,受到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张昀珠 由丹

《中国建筑史料编研(1911-1949)》(全200册)全国首发式在济南举行

本报讯 7月16日,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打造的《中国建筑史料编研(1911-1949)》(全200册)全国首发式在山东国家会展中心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成功举办,编号第001套移交国家图书馆。

《中国建筑史料编研(1911-1949)》是对中国1911-1949年建筑史料的一次最完整、最系统、最大规模的整理,所收录的史料源自国家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共计355种,近80000页,包括建筑期刊、建筑学专著,以及一批首次公开出版的行政规划文档、调查报告和说明书等,均为国家图书馆珍贵典藏。这批史料涉及面

非常广,包含了近代中国建筑思潮、学术研究、设计实践、建筑教育,以及城市建设、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极大地填补了建筑史料的出版空白。

《中国建筑史料编研(1911-1949)》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享誉国内外的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担任本书学术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惟敏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清华联合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方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建筑史强校,组织共14位专家对史料进行系统编目,并撰写130篇专项研究权威导读,收入第1册,具有极高的学术专业性和导向性。第2册

至第200册为影印史料,按内容分为六编,分别为:“近代建筑及其历史研究”“近代建筑结构及工程研究”“近代建筑技术研究”“近代城市研究”“近代建筑规章、机构”“建筑期刊及其他”。同时,该书设有多种索引,以便利读者检索、使用史料。

发布会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嘉宾直言,该书具有更广泛的学科意义,将为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堪称图书馆必备图书。《中国建筑史料编研(1911-1949)》不仅会推动中国建筑学的全面发展,而且将提升中国建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李晓



“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本报讯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开展党史研究,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近日,“继承百年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色文献研究专家学者及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及党校、党史机构、文献学界、历史学界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红色文献的收藏与整理、研究和传承。

此次研讨会由《图书馆杂志》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共同承办,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协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在致辞中指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上外具有深厚的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与红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很有渊源,为党史和文献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近年来,上外致力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承担了许多红色文献和历史文本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发挥语言优势,增强红色文本的叙事张力,拓展全球视野,打造红色文献的数据谱系。不仅要让红色文献活起来,发挥历史文本资政育人的作用,也要让红色文献走出去,在话语实践中彰显思想理论的价值。

国图召开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专家评审会

本报讯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专家评审会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高中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臧运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罗敏等10位专家参加评审。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汪东波出席会议,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马静主持会议。

此次申报立项工作采取单位申报、专家评审、项目资助机制,内容涵盖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

域,并重点加强红色文献的整理工作,为建党百年献礼。与会专家对全国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社等21家单位申报的22个项目逐一进行评审,遴选出符合要求的优秀申报项目,并对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国家图书馆从2013年开始面向全国组织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申报,带动全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取得丰硕成果,已形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抗日战争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等高质量的文献资料和系列出版物。截至目前,共立项294项,完成125项,出版图书7624册。

白玉静

《广西石刻》《广西历代诗歌》 新书分享会在桂林举行

本报讯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刻写历史,歌咏征程——《广西石刻》《广西历代诗歌》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广西桂林独秀书房·雁山店举行。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石刻》《广西历代诗歌》的领衔作者莫道才为读者们作了一场精彩的新书分享。

《广西石刻》与《广西历代诗歌》分别精选广西有代表性的石刻和先秦至清代的诗歌结集成册,并加以通俗易懂的解析,立体呈现“文化广西”的新形象,将广西文化鲜明地镌刻在中国文化的南方坐标上。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

划、组织编撰的“文化广西”丛书,是一套广西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读本,包括文学、艺术、风物、遗存、史传5个系列和1部综合性专著,共32种图书。该丛书入选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为广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文化广西”丛书系列的《广西石刻》《广西历代诗歌》《广西优秀传统文化概览》《广西汉语方言》《广西典籍》《广西历代名人》《寓桂历代名人》七种图书的出版任务,其中《广西石刻》和《广西历代诗歌》的出版,有助于保护和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手历史文化材料。

成能

“文载百年路,书写新征程” 红色文献特展亮相重庆图书馆



本报讯 7月23日,重庆图书馆联合四川省图书馆,以两馆所藏的丰富红色文献资源为基础,精选出172种文献,推出“文载百年路,书写新征程”红色文献特展。

重庆图书馆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在国统区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收藏了大量红色文献。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之后两年中重庆图书馆继续坚持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渝地区收集有关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献及其他各种古旧文献。通过这些努力,奠定了今天重庆图书馆丰富的红色文献资源。

展览除系统梳理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选集》等重要红色文献外,还特别展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萧楚

女1923年在重庆府庙新文化社印刷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我党理论家华岗分别于1930年、1938年托名潘鸿文、彭汉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1938年12月播种社出版的刘少奇《论青年修养》(实际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伪装本);1944年第一部系统编选的《毛泽东选集》;《新华日报》1945年8月19日下午4点出版的抗战胜利号外,全国保存至今不足10份;1949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谢唯真根据德文版,参考陈望道、成仿吾、徐冰、博古等人的译本进行重新翻译,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央苏区《黎川县内残留之“反动”宣传》手抄本等。这些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珍本红色文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 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7月16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清华大学主办,辽宁出版集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人民出版社承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中共中央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等来自全国理论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师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由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策划,组织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近百位专家学者编写,共计100卷2400多万字,于2021年4月完成出版工作。

该丛书是国内第一套权威、全面、系统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图书,是一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的重点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出版工程。丛书通过收集、整理、考证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

要经典文本,用扎实的文献史料充分展示了自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及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深刻影响。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研究出版取得新成果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和学术价值。丛书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白玉静



发言摘登

艾四林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一是回答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二是回答了理论发展中的问题,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把这些经典文本收集起来并作比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我国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形成史。三是力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理性建设作出努力。只有把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收集整理起来并作深入的考证研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学问做大,才能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点讲深,并能够从文本的历史比较、国际比较中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光辉历程、丰富内涵和历史经验。

杨建军 (辽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中宣部、教育部、辽宁省委、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共同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也是一项重大政治出版工程。丛书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传播的55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100个中文版本进行充分考证梳理,由100余位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与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深化党史国史教育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辽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重要体现。辽宁出版集团在做好百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出版发行的同时,将全面启动另一套百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的编写出版工作,倾力打造“双百工程”。

柳斌杰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回望百年,一批批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寻和救国救民道路的苦苦求索中,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相遇融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征程,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胜利的奇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从思想的源头再次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之路,以真实历史和独特视角记录了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这段历史,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能胜利和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这是国内第一套权威、全面、系统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图书,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研究,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和坚守的榜样。

李捷 (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百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以详尽的珍贵资料、权威细致的考证阐释,向读者展示了这一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浩瀚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产生两种需求。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传播的需求;一种是对系统梳理和学习运用在中国本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原创性贡献的需求。这两种需求双向互动、交相辉映,共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跨越时空、超越时代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思想伟力。

李忠杰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

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通考》广泛收集我国1949年以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逐本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版本、译文、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研究、比较分析,原汁原味地反映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传播的过程;通过对译文、版本、术语发展变化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来到中国的,也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动中逐步被中国人接受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一步步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王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一条独特路径,就是自始至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建党时期,李大钊就开始了这种可贵探索。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把这种优良的党风学风,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还拥有一支党领导下的专业队伍,以中央编译局、辽宁人民出版社为首的编译出版队伍,由北大、清华带头的一流大学研究教学队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开创了一套以知行合一为鲜明特征的马列著作中文版本系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可谓独树一帜,别开生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播下的思想火种,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首先,从《通考》中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过程。其次,从《通考》中我们也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许多经典著作的翻译,就是缘起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再次,《通考》同时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过程。从翻译版本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能够感受到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所体现的理论领悟深度。最后,《通考》还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编写出版工作,实际上就是以考据、介绍和翻译等形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不可低估。《通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这两个判断的真理性:一是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

入中国之前,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有利于党员干部学习党史达到党中央提出的“领会”“感悟”“深化”的要求。

杨金海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央编译局秘书长):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作为大型研究项目,让我们收获很多,对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一是通过深入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二是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三是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四是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们逐步探索出一套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下一步,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编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百卷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考据词典》等,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领域深耕细作,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出经验,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多作贡献。

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精品展亮相湖北省图书馆 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

本报讯 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精品展不久前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这是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首次联合展出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精品。

本次展览，两馆共展出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52件，有古籍、手札、碑帖、书画、铜镜、印章等。包括纪昀批注《史通训故补》、宋拓本《麓山寺碑》、汉代陈氏五乳镜等。

本次展览通过展板、展柜、数字化演示等多元化的形式呈现。数字化演示展现了徐行可与杨树达、张元济、马一浮、熊会贞、蔡尚思、余嘉锡等30余名学者以书会友的佳话。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号彊谿，湖北武昌人，藏书家。自1959年逝世至1961年，湖北省图书馆接受先生子女捐赠及他馆转入的徐氏藏书，“箱数逾千，册近十万”，其中多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徐氏藏品中的元明清人楹联、金石拓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拓本碑帖等文物，捐赠湖北省博物馆，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多，世所罕见，仅一级品即达54件。书画中包含大量名家艺术珍品，金石碑帖中乾隆(含)以前拓本达50件，其中明代拓本达30件，宋代拓本2件。徐氏捐赠中，清人文集和清代学者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金石、目录，以及考订经史百家的著作，较为系统完整，是其最大的藏书特点，其中稿本、精校本、精抄本尤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这些古籍是荆楚文化的宝贵遗产，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湖北省图书馆近年来持续在徐氏相关领域开展整理与研究，建立专馆，编辑整理纪念专集、善本图录，影印出版徐氏旧藏，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进一步挖掘徐氏旧藏价值，弘扬徐行可先生化私为公、嘉惠学林的高尚精神。

今年是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本次展览将能激发社会公众更多关注图博事业，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又讯 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图书馆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冯天瑜，荆楚文库编辑部主任周百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谢冬荣，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赵慧，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献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玉文，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逢彬，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专家、研究馆员李国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恩林，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特聘研究员王皓，研究馆员徐力文，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杰，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荣，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所所长杜朝晖，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陈谊，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才，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刘伟成，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任常务副馆长万全文，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杰民、王涛，湖北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研究员王晓钟，湖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马志立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前，冯天瑜、万献初、孙玉文三位教授向湖北省图书馆捐赠了他们的著作，冯天瑜先生还向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分别题赠“鄂图藏珍”“鄂博藏珍”条幅。

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上半场为专家主旨发言，主持人刘伟成；下半场为专家依次交流发言，主持人万全文。会议上半场首先由谢冬荣发言，他代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的义举表示崇高敬意，他祝愿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他希望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不断加强徐氏旧藏的整理、研究、开发、利用。冯天瑜追忆，少时即从其父冯永轩先生处获知，湖北徐行可乃现代中国有数之藏书家，其收藏特色为“所储皆土用书，大多稿本、精校本”，显示了行可先生终生不懈的追求，慧眼识珠的学术功力和卓识。行可先生昭显后世的功德，不仅在于书籍的丰富、珍贵，尤其在于对国家民族的奉献精神，“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这是新一代藏书家的精神。他列举了张舜徽先生、姚雪垠先生及自己利用徐氏捐赠古籍的实例，并建议湖北省图书馆要传承和发扬行可先生这种专门服务的精神。周百义总结了徐行可先生购书、藏书、抄书、校书、救书的事迹，对先生捐藏事迹及其高尚精神不胜钦佩。王晓钟系统介绍了湖北省博物馆藏徐行可捐赠文物，主要有书画、金石、碑帖、印章等，对于这些文物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马志立向与会专家、学者汇报了近年来湖北省图书馆徐行可捐赠古籍的研究成果。

会议下半场，赵慧回忆了自己在湖北省图书馆参加徐行可捐赠古籍编目工作的经历。她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徐氏藏书在文化湖北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万献初、孙玉文、杨逢彬、李国庆、周国林、董恩林、张三夕、李明杰、周荣、杜朝晖、陈谊、陈才等专家分别就徐氏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一致肯定了湖北省图书馆和博物馆对徐氏捐赠古籍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次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会上交流学术观点，为湖北省图书馆、博物馆下一步整理、研究、开发、利用徐氏捐赠古籍、文物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湖北省和湖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江水



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郝敬及其《毛诗原解》《毛诗序说》

□向辉(国家图书馆)

《毛诗原解》和《毛诗序说》是明代郝敬(1558-1639)的两部诗经阐释著作，是郝敬的经典解释著作体系中较为重要的论著。

郝敬字仲與，号楚望，自署康乐园主人，湖北京山人，世称京山先生，以经学儒术著称于明史。

如今，知晓郝敬名字及其著作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一部分专家，他们大多是研究宋明理学、明清儒学或古籍善本的专家。

一方面，黄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学案》中提到了他，不仅为他立了传，还选了他的数十条语录。然而，性理学家系谱中，郝敬实在算不上有名望的，最多是群星闪耀的理学星空中的不那么起眼的一个而已。

另一方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经部》中著录了郝敬《九经解》一百七十五卷(第59、60号)，又在《子部》著录了郝敬《知言》二卷(第6616号)，还在《丛部》著录了郝敬《山草堂集》二十八种一百五十卷(第385号)。国家图书馆藏有郝敬《九部经解》中的《尚书辨解》《毛诗原解》《仪礼节解》《春秋直解》和《论语详解》等五种书，原本存放于普通古籍书库，后来在“提善”工作中，也就是将普通古籍的精品挑选出来加入“善本”序列，进了善本书库。然而，中国古籍善本浩如烟海，郝敬的著作写于晚明，多刻于晚明，实在算不上古籍善本中最令人兴奋的。

所以，郝敬其人其书也就只能隐没在历史之中，等待后人去发现了。

一

天才总是成群结伴而来。如果从郝敬的朋友圈来看，有焦熹(1540-1620)、董其昌(1555-1636)、高攀龙(1562-1626)等，这些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进士朋友。还有“剧坛伟人”汤显祖、《红拂记》剧作家张凤翼等艺文友朋。

郝敬在永嘉县时，汤显祖正在浙江遂昌县令任上，两人也有诗文往来。汤显祖给郝敬的诗，题《郝永嘉谈处郡佳山水欣然》。郝敬写了诗谈永嘉的山水气象，汤显祖回了一首：“一郡高居接少微，郎官星里送余辉。江天直下双门近，海寺东来万法依。洞满朝阳云乍起，树悬春雨鹤初飞。因君得附双凫影，未笑吾兼吏隐非。”(《玉茗堂全集》卷八)汤显祖和郝敬一样，都是有大才气之人，也都有一种批判现实的洞见，也都不得官僚集团的容纳。但他们这些人还有儒学的精神信仰在，也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汤显祖在《牡丹亭》开场有一首《满庭芳》词：“西蜀名儒，南安太守，几番廊庙江湖。紫袍金带，功业未全。华发不堪回首，意抽簪万里桥西，还只怕君恩未许，五马欲踟蹰。”

无论是汤显祖，还是郝敬，都曾有过名儒的理想抱负，不过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怀揣着梦想的人，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位成为伟大的剧作家，一位成了伟大的经学家。

在准备写《毛诗原解》之前，郝敬是否想过要成为一名释经学家呢？他似乎并没有想过，他会耗费中年以后的绝大部分精力来做经典的阐释，或许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代经学阐释的大家，他只是在京山的康乐园中审慎明辨地思考、旷日持久地

写作，十多年的光阴逝去，终于完成了对《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九部经书的系统且完整的解读。

在写完并版刻《毛诗原解》之后，郝敬是否想过要让他书成为一部经典呢？“偶阅《古序》，觉食美芹。人各有心，问之同学，可则与众公之；若其否也，野人无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它。”(《毛诗序说题辞》)他似乎并没有想过他的书能传诸后世，成为不朽杰作，也没有设想有朝一日他的书能够传播到日本、美国、欧洲，三四百年后这些书又经由网络再回归故土，让国人有机会重新认识曾经有过他的一家之说，有这么一部经典。他只是继续前行，在远离大都会的湖北京山，著书立说。

郝敬在地方和京城做过官，官阶不大不小，足以光宗耀祖；郝敬出版过诗文集和时文著作，虽不是艺术典范，但也颇为士林推重，实现了那个时代很多知识人的梦想。但他最后选择了另外一条孤独而艰辛的道路，要凭一己之力重新进入到经典的世界之中，带领我们更好地进入到人文的历史之流。他尝试着做了做，无悔地做了下去。他没有通过学术获得巨大的荣耀，也没有通过写作得到学术的高位，他只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努力做点什么的知识人的缩影罢了。

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个能做的、可做的、和该做的事情罢了。他们相信，文化是通过经典的细致阅读、用心理解和疏通阐释来传承的。他们相信文明是通过精神的相互感通、性情的相互领会和行动的代际接力而延续的。他们相信情感是通过文明的化成、文化的明觉和人生的嵌入来沟通的。

对他们而言，数十年的皓首穷经，并不是生命的虚度、光阴的弃掷和理想的无存。没有理想的人，是无法成为一个经学家的。像郝敬这样的经学家的一生，所示范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追求。当人到中年，四十不惑谈何容易。未来当如何去完成，诗意的家园又当如何去建构，都在他们激活那些古老的文字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

对他们而言，数千年的经典诠释并不是无意义的折腾、无目的的述说和无信仰的言语。经典是活的，特别是那些经先贤之手所造的典，用前辈之心所释的经，都在无尽的时间中为人提供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信念源泉。

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所写的，是在用他们卑微的生命之光，无畏的奉献之旅，恒久的坚持之力，讲述一代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的历史，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存在必定是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必将是存在的历史。这也就成了我们读他的书的原因之一。

二

经学世界是由历代经学阐释者共同创造的。晚明时代的郝敬，遍注九经，从系统地细读经典出发，以批判的阐释和经学的自觉为路径，以重构经典人文价值为鹄的，卓然屹立于晚明儒林。

中青时代的郝敬，追求进步，心忧天下，身处庙堂，针砭时弊，著于史册；壮年以后的郝敬，退隐于乡，一心著述，遍注九经，诠释经义，刊诸梨枣。

《诗经》是郝敬一生学术与政治的专业。他“幼守一经”“蚤岁授《诗》，成进

士”。郝敬年轻时就专攻《诗经》，并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以《诗经》进士及第。在宦海沉浮十余年后，郝敬回到家乡，致力于经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1605)冬，郝敬四十七岁，开始撰述《毛诗》的新解；万历四十四年(1616)，郝敬五十八岁，《毛诗原解》刊刻完成；天启五年(1625)，郝敬六十七岁，他的《毛诗序说》雕版印行。前者纳入《九部经解》，后者列入《山草堂集》。

《九部经解》《山草堂集》都由郝氏家塾雕版制作发行。这两部著作是我们了解郝敬学术的入口。《九部经解》一再刷印，再三修订，传本流布大江南北，并东渡扶桑，西传欧陆，至今仍是不少图书馆的古籍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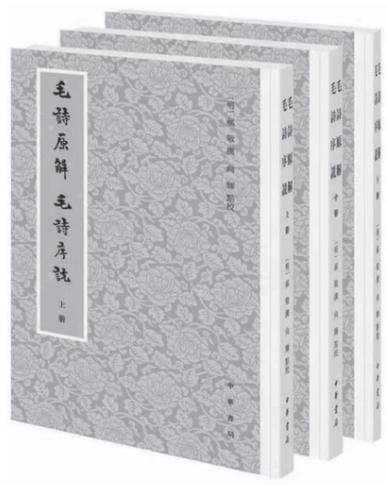
李维桢评价郝敬的《九部经解》时说，郝敬于经典阐释追求自得之学，“质之理而未顺，反之心而未安，即诸大儒训诂，世所谓习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圣人之心，不悖圣经之理而止。广大精微，简易明备。起汉宋诸君子九京而与之扬扚，必为心服首肯矣。”(《旧刻经解绪言跋》)正因为有了“广大精微，简易明备”的著作特色，坚持了经学主义的立场，他的书很快得到了士林的推重，他本人也成了晚明甚至是整个明代儒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该书刊行后的百余年间里，举凡应考者、为官者、经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读过并受它启迪的不在少数。

是非自有公论，学问当有允评。清初的史学家对郝敬的经学评价极高，如黄宗羲说郝敬是明代最伟大的经学家——“明代穷经之士，先生实为巨擘”；万斯同(1638-1702)则说郝敬是当时所有年轻经学家的偶像——他“超然朗诣，不袭先儒陈说，穷经者尽宗之”。全祖望(1705-1755)说郝敬和季本(1485-1563)两人，是明代经师中杰出的代表——“有明三百年，经师寥寂，而季长沙(季本)、郝给事(郝敬)称为雄霸。”

世易时移，郝敬著述的雕版板片朽坏不存，他的书也大多不再印制，知道他的人日少一日；而在他影响下的一批学者成长起来之后，勤于著述，后来者追慕新风，郝敬的影响也就愈发式微。

《诗》云：“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三四百年之后的今天，一如不少重要的思想家、经学家，郝敬未曾过时。从二十世纪的中外学术研究来说，他的哲学思想有日本阳明学研究者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2017)等人在著作中予以细致阐发；郝敬的《尚书》《四书》阐释有台湾傅兆宽、张晓生两位的博士论文加以分殊探究；他的著述及留存情形和他的诗经学主旨有蒋秋华、西口智也的专文予以揭示；他的儒学志业，有香港谢茂松博士专门研究。国内高校的年轻学者中，有武汉大学董玲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陈德明博士分别在2005年和2015年完成了以郝敬为对象的博士研究。

郝敬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渐深入，郝敬的文献整理也在此过程中提上了议程。此次中华书局出版《毛诗原解》《毛诗序说》两书的点校整理本，必将为郝敬及明代学术研究提供更为便利的读本。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郝敬的其他现存著述将以新的面貌回到儒学、经学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而关于他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当然，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新整理郝敬的著作，不单单是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生活在祖国这片大地上的一位学者，不单单是为了回忆儒学哲人曾经的艰辛探索，毋宁说，今天重读郝敬是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编纂了第一部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他们以“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作为“善本”的收录标准。郝敬的著作符合上述标准中的流传少的原则，也符合文物性和资料性原则，所以其《九部经解》和《山草堂集》幸存残帙皆得以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第59、60号著录“《郝氏九经解》一百七十五卷，明郝敬撰，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本”。细目包括：《周易正解》二十卷《读易》一卷、《尚书辨解》十卷《别解》一卷、《毛诗原解》三十六卷《读诗》一卷、《春秋直解》十五卷《读春秋》一卷、《礼记通解》二十二卷《读礼记》一卷、《仪礼节解》十七卷《读仪礼》一卷、《周礼完解》十二卷《读周礼》一卷、《论语详解》二十卷《读论语》一卷、《孟子说解》十四卷《读孟子》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残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带丁丙(1832-1899)跋文全本。不过，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中中说：“藏非一家，殆亦合璧而成耳”，他得到的这部书也不是一次性收集齐的，而是从好几位藏家中凑齐的。

通过古籍的整理，让他的著作化身千百，则郝氏其人其书都将重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此前，郝敬的著作《易领》《艺圃论》《读诗》等有整理本，其他著述则付诸阙如。如今，经朱兆虎先生、许庆江先生等中华书局友朋的努力与付出，郝敬的大部头著作第一次有了较为完整的整理版本，虽然这才是他繁富著作体系的一小部分，但总是起了头。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得到重视的今天，像郝敬一样的古典学家们的著作不断被整理出来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这不仅是古人古书之幸，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自信的见证。《诗》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周文之所以繁荣而自信，儒学之所以传承而不息，以此。

《近思录详注集评》： 解读《近思录》的经典之作

解读国学经典《近思录》的经典之作
朱子学研究泰斗陈荣捷集110余种注评版之精华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作序力荐
欲读懂朱熹，必先看《近思录》；欲读懂《传习录》，必先读懂《近思录》

近日，国际朱子学权威陈荣捷先生的大作《近思录详注集评》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

《近思录》是宋代大儒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著作。二人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理学大师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六百二十二则语录，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异端、圣贤十四卷结集成书，详细、系统、全面地展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近思录》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集中了大儒们的思想精华，是理学大成开山之作，有“性理诸书之祖”之称。理学在宋以后主宰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思想七八百年，而“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近思录》也是承前启后的经典，是新儒学的纲领，并为阳明心学提供了丰腴

的思想素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将《近思录》与《论语》并提，推荐为国人必读的九本书之一。

《近思录》的注释版本非常多，其中好的注本有宋代叶采的注本和清代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的集注本，而当代的集注珍本要属国际朱子学泰斗陈荣捷的《近思录详注集评》。

陈荣捷先生是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权威，曾将《近思录》翻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人。他的《近思录详注集评》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朱注朱”，二是博采众长。陈荣捷选用朱子论述八百多条，“以朱注朱”，一不离本意，二容易理解，因为朱熹极善于用浅显的比喻来让人理解深奥的内容。

陈荣捷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阅历，博采众长，从朱熹的著作以及中日朝三国学者110余种校注、

注释版中，筛选出1300余条精辟独到的注解评语，又对《近思录》原文涉及的典籍术语、人名地名等详细加以注释，堪称解读《近思录》的经典之作。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家及哲学史家陈来教授称赞该书“功力深厚，完备翔实，超迈前人”。

与其他的《近思录》集评本不同，陈荣捷做集注，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注解罗列出来让读者看得头晕眼花，而是精心甄选，将那些针对读者读不懂、容易理解错误的词句所做的注解评语挑出来，其集注不在于多而全，而在于恰当而精辟。有一条便一语中的的，也有从多个角度对一句话的理解进行多层次阐释的，其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准确、深入理解经典的含义。

如果想读懂《近思录》，《近思录详注集评》无疑是不二之选。



关于《近思录》

将先贤的真知灼见以语录体的形式来呈现的经典，人们熟悉的是《论语》《道德经》《传习录》等，同样的经典《近思录》虽然畅销近800年，曾经读书人人手一册，在现当代却被忽视和严重低估。如今人人都追捧《传习录》，殊不知宋以后塑造、奠定中国人乃至东亚人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的是《近思录》。正如台湾学者朱高正所言：“没有《近思录》的基础，你去读《传习录》，你自以为懂，其实是不懂的。”

更为重要的是，《近思录》是了解朱熹思想的起点。朱熹在编撰《近思录》时正处于创作的井喷期，当时他已完成对周敦颐、张载代表作的解读，也将二程著作整理完备，思想成熟，对于大师们的思想与作品了然于胸。在《近思录》中，他巧妙地把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之说与二程性命学说贯通融会，把宋代理学的源头从二程推到周敦颐，又将张载的《西铭》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自己的思想不再限于二程学，融会北宋四子学说于一体。可以说，朱熹用周、程、张的语言建立了自己简明精巧的理学体系，《近思录》的问世是朱熹学派

及其思想确立的标志。《近思录》编好之后，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基本上就定型了，后来只是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而已。所以，欲读懂朱熹，必先读《近思录》。

朱熹称《近思录》为“圣学之阶梯”。他解释说，《四书》是儒学元典《五经》的入门阶梯，《大学》是《四书》的纲领，《近思录》按大学“三纲八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模来编辑周、程、张四子语录，所以读《近思录》可以和《大学》相补充，并循级而上，渐登圣学殿堂。如果说《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浓缩版《大学》，《近思录》便是完整版《大学》。

从内容来看，《近思录》广博而贴己，集“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谈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天地是怎样构成的，人性是怎么来的，人的气质如何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如何提升自我的修养，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是怎样的。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的传播，《近思录》中的思想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现代读者若想走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堂奥，阅读《近思录》是一条终南捷径。

关于陈荣捷

陈荣捷（1901-1994），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权威。

1901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1916年考入香港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和中文。1924年岭南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英语系，1926年改入哲学系。1929年以题为《庄子哲学》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夏威夷大学任教职。1943年任美国东北名校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教授，1951年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是当时东方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1966年自达特茅斯学院退休，被授以“中国哲学和文化荣誉教授”的称号。

20世纪60年代为各种英文百科全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词条，被欧美学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资料的英文翻译。1963年，四部英

文译著《坛经》《王阳明〈传习录〉及其他著述》《老子之道（道德经）》和《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又名《中国哲学资料书》）在美国出版。其中《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集十余年之功，英译标准极高，至今无人超越，一直是美国院校教授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

197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兼任教授，与狄百瑞教授联合执教哥大新儒学讨论班，直至晚年。

1978年被选为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美国“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将全部的学术关注集中在对朱熹的研究和对朱熹研究事业的推动上。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组织召开“国际朱熹会议”，成为当时世界朱子学术研究的最高峰。朱子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有《近思录详注集评》《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熹》《朱子新探索》等，另有作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



《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完成编纂出版 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 7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六十载使命接续,千百卷传奇完璧——《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来自全国的戏曲文献研究专家学者,古籍界、出版界专家汇聚一堂,共同庆祝《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完成,对古代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展研讨。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处处长章隆江等领导出席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发表书面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跃进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分别主持会议。

魏大威在致辞中对《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编纂出版完成表示祝贺。他指出《丛刊》的发起人郑振铎先生与国图渊源深厚,毕生热爱和关心中华古籍的抢救与保护。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直在推动古籍资源整理再造、挖掘研究与开发利用的积极探索。他强调,今后国家图书馆还将不断推出符合时代价值导向、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品典籍整理成果,努力把“古籍文献的丰富内涵研究准、阐释好,呈现给读者看、讲述给人们听,让典籍中的一个文字真正跳动起来”。

王文章在讲话中谈到,《古本戏曲丛刊》出版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文献价值以及艺术价值,丛刊编纂从规模、系统性、丰富性等方面都史无前例。丛刊由几代学人和多家出版机构孜孜以求,倾注心力,努力接续,默默奉献,终于圆满完成,这是我国戏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成果,是我国文化出版工作的盛事。同时他建议继续开展近现代戏曲丛刊的整理研究。

廖奔在书面致辞中指出,《古本戏曲丛刊》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之一,丛刊出版是我国出版事业整体业绩

的生动写照,对于推动戏曲研究和戏曲学科建设功莫大焉。他认为,没有《古本戏曲丛刊》,就不会有《中国戏曲发展史》。《丛刊》实现的是学术的积累,是文化的传承。社科院文学所科研处处长李超代读了廖奔的致辞。

刘跃进强调了郑振铎先生是《古本戏曲丛刊》伟大的设计者、开创者,有首创之功。丛刊能够跨越六十余年完美收官,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除了经济条件改善外,更重要的是国家的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再创中华文明辉煌。通过这项工程,我们的结论是,一要靠开创者郑振铎先生的个人能力,二要靠研究机构、学术界、出版界精诚合作的集体力量,三是古籍小组及国家各部门的支持至关重要。

章隆江表示在郑振铎先生矢志不渝的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古本戏曲丛刊》终于完璧。历届古籍小组对《丛刊》出版工作都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大力支持,将其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给予重点资助,丛刊出版是当代古籍整理出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先生回顾了《丛刊》六十余年的历程,特别是六、七、八集立项重新启动的过程。他认为丛刊全十集的出版是古籍出版的里程碑,可喜可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回顾了参与丛刊选目、研究的历程,谈到丛刊出版对戏曲史和文学史研究的重大价值,对推动古典戏曲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文献支撑。

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教授陈力,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卜键,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戴云,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奚彤云,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

彦,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出版座谈会。

在自由发言阶段,以上来自出版界、收藏界、学术界、研究界的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古籍研究和古籍出版提出了建议与见解。与会学者一致赞叹,这六十八年的学术接力,不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不论处于哪个阶段,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来不是为了一个硬性派下来的任务而努力,大家的工作不带有任何行政色彩,只是自觉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奋斗,共同接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丛刊》。

与会专家认为,《古本戏曲丛刊》历经六十余载,倾尽几代学人心血,历经时代变迁,坚持不懈,集腋成裘,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最大的传统戏曲作品的结晶。一千余部古代戏曲珍本由本次编纂出版,化身千百,保护传承,是古代戏曲文献整理、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做好当代古籍整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项目,必将在新时代展现独特魅力、绽放新的光彩。

《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先生发端并主持编纂,郑振铎先生计划编纂十集,并主持了前四集的编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先生1958年不幸殉职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新组织了编委会,由吴晓铃先生继续主持编纂。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官宫廷大戏十种。此后《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暂停。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后《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又停顿了近三十年。2012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先生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建议把《古本戏曲丛刊》后续部分的出版任务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使这一重要的文化工程得成完璧。



程先生的建议得到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搁置近三十年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很快被列入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积极争取认领承担了这一项目。

2014年1月,“《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启动座谈会”召开,标志着这一重要项目全面重启。2016年,《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出版,收清代顺治至乾隆前期的传奇和戏曲别集七十七种,共计一百零九种剧目。2016年8月,“《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出版暨《丛刊》文献及文化意义座谈会”召开,与会学者对

项目重启,《丛刊》第六集的顺利出版给予高度评价。2018年,《古本戏曲丛刊》(七集)出版,收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传奇作品和作家戏曲集五十五种,其中包括戏曲集八种,合计收入传奇、杂剧共九十二种。2019年,《古本戏曲丛刊》(八集)出版,收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传奇、杂剧七十七种附二种,合计传奇、杂剧八十一一种。2020年底,《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出版,收入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传奇、杂剧七十三种附一种,合计收入传奇、杂剧一百三十八种。《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1193种,合计成书141函1398册。 林莹